

他山之石: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比较研究

柏慧萍

(贵州省体育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分析了中西方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合理性与效用边界,研究认为:西方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是一种西方现代社会的公共政策,其匹配的语境是民主社会、分权制度、阶级分化、阶层联合,其功能性载体是次级社会团体。我国通过组织化行为构建了“单位式”体育利益表达机制,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弱化横向的社会政治联合、强化纵向的隶属关系和上达机制、局部协调解决利益矛盾,这种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依法治国、体育社会化的市场进程中,必须通过利益结构整合,构建一种主流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

关键词:体育管理;利益表达;利益整合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7)03-0021-05

Calm Consideration on Sporting Interests Expression Mechanism

BAI Hui-ping

(Guizhou Province Sports Bureau Gymnastics Administrative Center, Guiyang 550002,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ion of sports interest's express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border. Western sports interests expression mechanism is a modern social of public policy, its match of context is democratic social, and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and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class joint, its features sexual carrier is secondary social groups; my building has different Yu Western modern social of units type sports interests expression mechanism, this sports interests integration structure of features is weakening horizontal of social political joint, and strengthened longitudinal of under relationship and Shan up mechanism, and local coordination settlement interests contradictions. Only units unable to solve while higher authorities could not intervene directly in the case, the State will build a series of mainstream sports interests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interests integration structure, this is the current sports scholars to explore interests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the sports form.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 expressions of interest; integration of interest

体育界学者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缘起于何种社会,其立论基础是什么?我国是否存在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如果存在又是什么模式?上述问题指向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真实意蕴及其效用边界。本文探讨的正是被体育界频繁使用却亟需澄清的热词——体育利益表达机制。

1 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论域:社会公众基本权利诉求

在近些年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研究的热潮中,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论及“体育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易剑东、曹可强于2012年分别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提出: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是体育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重要

环节^[1-2],甚至是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逻辑起点^[3];政府只有认真倾听民意才能够切实供给体育公共服务^[4];政府必须构建制度化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以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5]。体育公共服务与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在何种程度上契合,又在何种意义上背离?其实,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是发展权、体育权、教育权的公平公正。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是政权存在的基础。因此,体育利益整合方式必然存在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而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只是其中存在的某种形态——沟通并平衡不同群体多样化体育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之一。

秦小平等(2011)直接以“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为题,探讨基层群众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问

收稿日期:2017-01-06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黔教合KY字[2012]100号)

作者简介:柏慧萍(1958—),女,贵州贵阳人,高级教练,国际级体操裁判。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

题^[6],以及转型期体育利益表达的实现方式问题^[7]。可以认为,体育利益表达是实现社会公众诉求的基础,提出构建包括上访、接待日、媒体帮助甚至网络、自媒体、微时代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设想,旨在构建畅通的体育利益表达渠道。事实上,借助新媒体表达体育利益诉求不仅在内容上难辨是非,信息的筛选与管理上也存在诸多新的问题,导致制度成本不断攀升。诚然,社会上存在多种表达渠道和不同声音是好事,但是,倘若“博主”“大V”们假以面目行不法之事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基于此,学者们提出构建制度化、法治化体育利益表达机制防患于未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基于“体育利益”探讨“表达机制”的论题日渐广泛出现于舆论媒体。比如,方新普等从社会转型的脉络梳理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变迁及其特征,进而指出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三次重大转变及其特征^[8];程林林等(2010)从公共政策学的视角研究体育利益格局演变分析框架,得出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居于体育利益格局分析框架的重要位置^[9];再如,有学者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探讨体育利益格局均衡的制度保障,认为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是实现体育利益格局均衡的条件之一。刘玉(2010)在探讨体育利益整合问题时提出,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是体育利益整合的一个关键步骤,承担着上传下达的社会功能^[10],甚至是实施体育利益整合的一个逻辑起点问题。黄毅、高志红于2007年研究了基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利益差别,探讨各自的利益表达方式,认为竞技体育相对于群众体育处于强势地位^[11],而中国是一个只有强势群体声音的社会。当然,程林林(2011)在《当代中国体育利益格局演化研究》一书中,梳理了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发展演变^[12]。

上述研究并没有触及中外体育利益整合方式或者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比较,由此引申出一个新的命题——“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借鉴与扬弃。

2 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场域:西方社会阶层分化联合形成次级社会团体

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是西方现代社会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组成部分,社会公共利益表达源于美国的次级政府概念(notion of sub-government)、英国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13]以及德国和荷兰政府的治理理念,其存在基础是阶级观念和次级社会团体,

而西方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次级社会团体恰恰就是阶级及其进一步分化形成的阶层。

所谓阶级一般有3种意义:一是作为声望、地位、文化或者生活方式的阶级;二是作为结构化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阶级;三是作为实际的或者潜在的社会和政治行动者的阶级^[14]。西方社会将阶级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意指以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位置,阶级特征是在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而利益是联系结构性位置的节点。显然,阶级是根据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等自然分化、自发形成的群体形式,阶级观念则表现为群体内部的认同或者群体外部的疏离。虽然,阶级内部的相对同质性预示着西方社会存在整合的可能性,但是,阶级(阶层)之间的异质性导致西方现代社会更多地表现为多元次级社会团体对抗竞争的格局。

“次级社会团体”是西方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现象,其独立于政府部门,是非亲属关系的社会联合体,是西方现代社会整合公共利益的基本单位^[15]。次级社会团体作为社会性功能载体以横向社会参与为基本方式,将具有相近身份、地位、价值观的群体利益内聚,并将利益诉求传递到决策过程中。次级社会团体具有自由选择进出、社会参与广泛、关注主题内部共享、横向联合能力强等特征。但是,次级社会团体不具有行政权力,无法制定内部政策,只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府部门施加影响。比如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供给上,劳工阶层倾向于政府提供大众化体育产品;中产阶层希望政府考虑多样化体育产品的供给;精英团体则注重私密性体育产品的数量。那么,要想实现社会公共体育政策倾向于本阶级的利益,除了具备民主分权制度、多元社会结构、阶级阶层联合外,还必须具备2个条件:一是次级社会团体足够强大,能够有效影响体育政策制定过程;二是社会具备制度化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以构建法治化的次级社会团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化解多元次级社会团体对抗竞争的格局。

西方的次级社会团体是一种全社会横向的阶级阶层联合,且不存在纵向的隶属关系,因此,其具有足够大的力量与政府对话,满足了条件一;条件二则是西方社会稳定的保障性政策,要想协调不同阶层之间的体育利益矛盾必须具备政府与各阶层的有效沟通,构建制度化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随即成为逻辑起点问题。

可见,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与次级社会团体是一种

匹配关系,其存在的场域是西方社会在民主和分权背景下,由于阶级分化和阶层联合进而形成的次级社会团体。当今中国,“阶级”这一概念已经无法与现实政治实体吻合,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经由次级社会团体实现利益整合。虽然,有众多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存在着层级或者等级现象^[16]。但是,他们都没有证明阶级或者阶层作为一种身份团体在我国承担着整合并上达公共利益的责任。那么,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是如何内聚、整合、上达的呢?毕竟一个稳定的社会不可能没有整合公共利益的行动单位,不可能不存在体育利益表达机制。

3 利益整合: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

沿着分析西方社会现象的理路或者说西方公民社会的视角^[17],无法发现我国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因为不存在功能载体——次级社会团体。然而,在我国体育领域乃至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利益分配尚存在较大差别的情况下,并未形成社会危机。原因是,我国社会存在承担体育利益内聚、整合以及上达的运行机制和有效载体——工作单位,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性结构,在计划经济时代替代了某些社会性功能。

课题组历时5年(2011—2015)实地调查了安徽省、江西省、江苏省和浙江省的11所高校的教代会运作情况,并对有关学校校教代会筹备组的人员进行了非结构化访谈,并对其中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皖南医学院做了重复性的验证调查。基于此,得出以下3点结论与启示:

一是,教代会提供了教职工参与机制,将教职工的体育利益整合内聚并沿行政渠道上达利益诉求。但是,这种参与仅限于高校内部,集中反映在教代会讨论的主题——教职工健身场馆建设以及更加广泛的奖金、工作环境、住房、交通等议题,会后根据教职工切身利益关切出台一系列仅限于内部使用的政策。在这种意义上,高校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特殊政策,甚至能够以种种借口延缓执行上级文件精神。

二是,教代会旨在促进教职工的福利、协调内部利益分配,但其明显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具有阶级利益聚合功能的劳工联合体。因为,教代会的结构与高校领导层高度重合,教代会的组织者(校工会)与领导层(机关行政)权力不分化,甚至是机关行政直接组

织教代会,而校工会负责意见征集、信息传达、会议服务等。现实中,教代会从来都不是教职工与领导层斗争的舞台,教职工也从来未曾要求与领导层分享权力。因此,高校教代会的功能演变为搭建平台、整合意见,将个体体育利益诉求纳入体制掌握之中,以形成教职工对高校行政的支持,属于一种防护性制度安排而非西方的制衡性制度安排。

三是,教代会代表名额按照职能部门和学院分配,代表绝大多数是部门负责人,他们不是代表自己的身份团体而是代表所属的部门。在高校中每一个这样的部门都被构建成为一个内部成员利益分享的共同体,于是部门领导具有了行政管理者和利益代言人的双重身份,与之匹配的是单位承担着利益整合和行政管治的双重职能。因此,单位既是自上而下行政管治性的,又是自下而上利益内聚性的。这种结构在有效整合内部利益的同时亦增加了行政管理的难度,一旦利益整合功能失效,行政管理必然陷入僵局。

事实上,银行、电力、电信等行业都有各自意义上的“职代会”,只是名称不一,但功能趋同。因此,完整的单位式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浮出水面:单位构建一种诸如教代会或者职代会的制度化平台→把分散的体育利益诉求整合起来→单位出台内部政策协调解决体育利益矛盾→单位将无法解决的体育利益矛盾通过纵向隶属关系逐级上达→单位将上级意见地方化处理(或者选择以上级文件压制个体体育利益诉求,或者选择部分解决内部成员体育利益诉求)。国家的策略是将体育利益诉求由横向的政治联合导向局部参与和处理,将体育利益矛盾化整为零地引入体制内,实现在单位内部协调解决,避免引发大的社会矛盾冲突,减轻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政治压力。正是这种弱化横向政治联合、强化纵向隶属关系、以局部利益内聚为主要特征的单位式体育利益整合结构,从个体满足和社会需求两个角度同时削弱了全社会横向联合及其表达机制存在的必要性。

从单位式体育利益整合结构的视角,审视各级体育局内部利益分配以及竞技运动员的层化现象——各级体育局以竞技体育工作为中心,将群众体育工作置于边缘,甚至出现群众体育的资金投入连续5年不足体育事业费1%^[5]的状况;奥运会冠军获得资本和媒体的双重青睐,而无法问鼎的运动员则反之。体育行政部门将内部成员的利益内聚,并且在观念上至少是行动上以国家利益之名服从行政决策,并通过政策手段处理利益矛盾。由于体育局的行政单位性质、

纵向隶属关系以及强制性的内部管理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差别只在于处理个案的手段和强度而已。正因为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并弱化了社会弱势群体体育利益的横向整合和诸如媒体、人代等体育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

4 取舍与扬弃:完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现实意义

中外学者都认同的一点是: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根本作用是为社会减压。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能够实现为社会减压,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值得提倡和借鉴的,有效的方式都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的探索。中西方的体育利益整合结构经实践检验均证实了各自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但是,任何一种体育利益整合结构都存在边界问题,取舍的标准主要是依据各自的效用边界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对此可以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体育利益整合结构。西方的体育利益整合是一种横向联合结构——阶级(阶层)内部利益聚合、外部利益竞争。西方现代社会呈现一种多元化结构,次级社会团体在利益博弈的基础上实现所谓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以致程序化、制度化、可量化的社会公平。博弈基础是攸关方的实力均衡,制度保障是民主分权制度,博弈基础、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成为西方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边界。然而,机会公平未必过程公平、过程公平未必结果公平、程序化未必科学化,横向整合公共利益未必就不具有排他性。我国的单位式体育利益整合是一种纵向链接、横向分割、局部解决的结构。其优点在于:能够出台内部政策弹性处理个别体育利益诉求,内聚单位成员体育利益诉求并纵向上达,弱化横向联合以减轻国家和社会的压力,内部整合利益向外部或者上级争取体育利益。但是,单位是有边界的,单位式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弱化了社会横向利益联系的动力,致使超越单位边界的阶级(阶层)空间难以形成。所以,我国的体育利益竞争常常在单位(机构、部门)之间展开,很少有个体向社会、国家控诉体育利益失衡的现象,即使有也很难成功。因为,个体从属于单位,国家依托单位进行利益整合,社会也没有给个体开通体育利益表达的渠道。

其次,功能性载体及其代言人的产生和责任。西方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性载体——次级社会团体是阶级分化和阶层联合的结果,代言人通过次级社

会团体内部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着本阶层的利益。他们的责任是内聚阶层成员的体育利益诉求,再通过制度化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尽心竭力地为本阶层竞争体育利益,以获得阶层内部的支持。我国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性载体——单位是组织化行为,代言人通过投票产生但无一例外地囊括了部门行政领导,只不过有选择地增添了部分先进典型人物而已。他们的职责是收集和筛选不同人群的信息,再沿着行政渠道上达体育利益诉求。当代言人的双重身份(部门代言人与行政管理者)发生矛盾时,代言人基于自身双重身份的考量自然会选择压制部门内部成员表达体育利益诉求的欲望,只有在涉及部门之间利益矛盾或者代言人自身体育利益的情况下,代言人才会选择直抒己见,对领导层构成一定压力。当然,无论是部门代表还是单位领导层都无意激化矛盾,因为这同样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单位获利多寡标志着代言人的权力地位。所以,他们在利益权衡后往往会将协调内部利益矛盾和为本单位争夺利益视为己任。

再次,协调体育利益矛盾的手段,以及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的必要性。西方协调体育利益矛盾采用的手段是次级社会团体与政府直接对话,通过阶层代言人与政府代表的谈判制定体育公共政策,政策的出台往往是攸关方博弈妥协的结果。显然,次级社会团体之间及其与政府之间的体育利益竞争是对抗性质的,社会公共制度中必须存在次级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才能有效避免产生可能的社会危机。所以,西方现代社会构建了制度化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我国单位结构协调体育利益矛盾采用的手段:一是出台内部政策弹性地解决个别体育利益矛盾,因为单位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二是沿行政渠道上达利益诉求,向上级部门争取更多资源以满足内部成员的体育利益需求,或者是以上级文件精神压制内部体育利益诉求,有效避免体育利益矛盾的扩散。所以,在单位式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全社会横向联合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没有存在的必要。

最后,我国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一是,单位的弹性政策反向导致单位结构内部利益激烈竞争,部门和个人投入巨大精力参与利益竞争,非常规手段频繁使用,寻租设租行为普遍化。通常状况下,单位内部的体育利益矛盾不具有一般性,很难发展到公共领域和国家层面。但是,单位本身具有阶层或地位差异,一旦行政失去权威或者内部成员

丧失信任,体育利益矛盾将演变为价值观念冲突。此时,如果社会没有制度化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则社会危机难以避免。二是,单位弱化了社会的横向联合,将社会分割成为无数的碎片,一旦单位失去了整合公共体育利益的能力,将产生大量脱离单位体制的群体,进而给社会带来冲击。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访、接待日、媒体帮助等体育利益表达渠道,此时,国家必须构建制度化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将这个群体的体育利益诉求纳入体制内,避免形成社会矛盾。

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属于社会保障制度。诚然,社会群体的体育利益需求尚次于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利益需求。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今天没有意识到或没有主张的权利,不等于没有这个权利或明天仍无动于衷。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就是要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将应然权利及法定权利落实为实然权利。

5 结语

正所谓,橘生南为橘、橘生北为枳。

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产生于西方分权制度和民主社会的背景下,属于社会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其社会性功能载体是由于阶级分化和阶层联合而形成的次级社会团体。西方社会的多元竞争格局必须匹配完善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以构建制度化的次级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否则体育利益矛盾将演变为体育利益冲突。

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形成的“单位制”“单位式”体育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机制,能够迅速内聚单位所属成员体育利益诉求,依靠内部政策弹性处理体育利益矛盾,并且具备制度化的纵向上达机制。正因为单位结构的有效运作,才弱化了社会横向利益联系的动力,致使超越单位边界的阶级(阶层)空间难以形成。横向的阶层联合及其表达机制也尚不具备存在的条件。至于当下学者探讨的上访、媒体,以至网络、自媒体、微时代等表达方式只是在单位式体育利益整合无效的情况下,社会自发形成的体育利益诉求表达方式和通道之一。对于这种国家主流制度安排的溢出问题,政府的责任在于将其制度化乃至法治化。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探讨的不是橘与枳、甜与苦

的因果转化,而是旨在“抛砖”,找寻人类文明可借鉴的经验,实现“问需于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法制化建设。

参考文献

- [1] 易剑东. 中国体育公共服务研究[J]. 体育学刊, 2012, 19(2): 1-10.
- [2] 曹可强. 上海市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J]. 体育科研, 2012, 33(6): 43-46.
- [3] 樊炳有. 体育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探讨[J]. 体育与科学, 2010, 31(2): 25-32.
- [4] 戴健. 中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报告 2013[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1.
- [5] 刘玉. 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转型与现实选择[J]. 体育科学, 2013, 33(2): 11-21.
- [6] 秦小平, 高嵩, 汪子文, 等. 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中居民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完善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8(2): 1-5.
- [7] 王杰, 刘玉.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研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5(6): 5-9.
- [8] 方新普, 黄文仁, 董红刚. 论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9, 32(3): 4-6.
- [9] 程林林, 黄旭. 隐性利益与体育利益格局演化分析框架(上)[J]. 体育与科学, 2010, 31(6): 1-7, 48.
- [10] 刘玉. 转型期我国社会体育利益整合机制研究[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0, 27(1): 8-11.
- [11] 黄毅, 高志红. 我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及利益运行机制变迁[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7, 22(3): 321-325.
- [12] 程林林. 当代中国体育利益格局演化研究[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1: 11.
- [13] A. G. JORDAN, J. J. RICHARDSON.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Policy Proces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11.
- [14]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阶级与分层[M]. 第3版. 陈光金,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6.
- [15] 张静. 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2-113.
- [16]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1.
- [17] T. H. 马歇尔, 安东尼·吉登斯.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31.

[责任编辑 江国平]